

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澳) 基姆·安德森 (日) 速水佑次郎
蔡昉 杜志雄等译 李周 金和辉等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蔡 昉 杜志雄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00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1-02553-8/F·291

定 价:8.50元

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透视中的东亚经验

Kym Anderson, Yujiro Hayami

Aurelia George, Masayoshi Honma,
Keijiro Otsuka, Eric Saxon,
Shun-yi Shei, Rodney Tyers

蔡 昉 李 周 杜志雄 金和辉
张元红 王灵俊 许军旭 解书森 译
李 周 金和辉 蔡 昉 校

译者的话

Kym Anderson 和 Yujiro Hayami 所主编的这本《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是 1990 年我和我的同事为当时研究工作的需要译出的。当时的打印本印数很少，但农业经济界不少同行向我们索要，以至不敷供给。当时虽萌生了正式出版这本译著的想法，但因诸事忙乱，未能认真操作此事。1994 年我到澳大利亚 Adelaide 大学访问，恰好遇到了 Anderson 教授，谈及此书，他对出版中译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随后我们分别与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学院澳日研究中心 Drysdale 教授联系，最终决定由该中心提供一笔最基本的成本补贴，资助本书出版。

当我们初译此书时，我们了解到一个经济是如何从对农业征税的政策转向对农业进行保护的。而当时我国农业还处于为工业化积累作出贡献的阶段。在与 Anderson 教授交谈时，我正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Garnaut 教授和黄益平博士合作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我们预见到中国农业正在从被征税的阶段向被保护的阶段转变。而到了本书中文版出版之时，中国粮食的国内价格已经全面超过国际市场水平，表明农业转折点已经实实在在地到来了。所以，这本书虽然是 10 年前写成的，但其中对农业发展政策转变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的分析方法，恰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正如 Drysdale 教授所说，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顺乎时势的”。

本书的两位主编 Kym Anderson 和 Yujiro Hayami 分别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Anderson 现任澳大利亚 Adelaide 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曾于乌拉圭谈判期

间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著作涉及农业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等广泛的领域。其所著《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书已被译为中文出版。Hayami 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其与 Ruttan 教授合著的《农业发展:国际前景》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经典的地位,与另一本杰出著作《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都被译为中文出版。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蔡昉、李周、杜志雄、金和辉、张元红、许军旭、解树森、王灵俊等。最后定稿时,蔡昉、李周、杜志雄、金和辉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译,补译了前言、附录和注释,并对全书译稿重新校对。第十章《富国和穷国:游说激励与保护形式》,系应 Anderson 教授要求增加的,原文刊登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42 卷,1995 年第 2 号。

最后,我要感谢帮助本书出版的 Drysdale 教授、宋立刚博士、田爱茹女士和余秀女士。

蔡 昉

1995 年 9 月于北京

委托人的话

由蔡昉牵头翻译并出版 Anderson 和 Hayami《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中文版,既是一项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又是顺乎时势的。

这本书最初来自于 80 年代中期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澳日研究中心组织的,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学家参加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课题。本书作为这项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对于人们理解亚洲人口稠密经济中的工业化过程与贸易及其他长期影响农业部门的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因其对于分析和理解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的贡献,在日本荣获享有声誉的 Tohata 纪念奖。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在东亚经济的较早发展阶段上,农业部门占很大比重,处于被征税的地位,以支持工业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农业的生产率滞后,在没有政策阻碍的条件下,农产品的进口会伴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相应扩大。然而,政治上反对农产品进口的保护要求,通常导致政策转向对工业和其他部门征税,以保护农民。这种政策代价巨大,抑制了工业产出和收入的潜在增长。因此,探索一条途径,通过在农业进口国家(地区)与农产品提供国家之间进行一种合作性的政策安排,以改变这种代价高昂的政策倾向,就成为人们兴趣所在。

说本书的翻译顺乎时势,是由于这里的讨论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由于中国工业的成功发展,其农业正在日益丧失产业比较优势。过去几年里,中国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一直在迅速向国际水平靠拢并超过,而农业自给自足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

策目标。东亚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表明,要维持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使消费者、纳税人和工业生产者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如何把握提高了的农业贸易依存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书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都将是中国在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下一阶段有关农业政策的选择所不可回避的。

我很荣幸地对蕴含如此重要意义的著作的出版有所帮助。蔡昉首先动议并实际组织了本书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家为本书提供了广泛而富有影响力的中国读者群,都是值得赞赏的。

Peter Drysdal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

澳日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版序

我们非常高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带头组织翻译和出版《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的中文版。虽然这本书写于10年前,写的几乎都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情况,但是它对今日中国仍有意义深远的关系。1868年日本首次开放国际贸易之后,政府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步结束了对农业不相称地课税的问题。然而,负面的政策体制并没有被中性的政策所替代,而是像西欧那样,被正面激励农民的政策体制所替代。由于设置进口障碍,产生保护主义的影响,进而使消费者和其他贸易品生产者的成本逐渐增加。台湾和韩国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只是在60年代初开放经济后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农业激励由负面到正面的转换。随着80年代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开始出现同样的趋势(Anderson K.《东亚的食品价格政策》,《亚太经济文献》第8卷第2期,第15—30页,1994年11月)。

现阶段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压力是使政府政策从轻农业重工业转向以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中性政策,还是最终转变成有利于农民而不是非农生产者的政策?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几年,确实取消了一些对农民的束缚。有一段时间城市食品消费者受到的庇护相当于食品价格上升幅度,但是近来预算上的压力导致取消了这些消费者补贴。

尽管最近5年中国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都在增加,但是政府的农业自给自足目标仍然保持。近来收成下降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进一步改善农民激励的新的压力。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继续不断地离开农业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长期看这一

目标只能靠把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到国际水平以上来实现,例如,通过更高的粮食进口关税。如果这一政策维持到 21 世纪,中国消费者、纳税人和非农产品生产者为此付出的成本——还不考虑已经脆弱的环境——几乎肯定呈指数式地增长。中国和与其相似的人口密集经济的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有利于增长和改善结构调整的途径,以适应所发生的比较优势变化,而不是试图抵制它们来放慢经济发展。我们希望这本书有助于刺激有关比中国的工业化近邻所采用的政策更为适宜的政策的研究。

对于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我们不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而且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日研究中心用它的农业政策研究基金(本书英文版获 1987 年日本国家促进研究所颁发的 Tohata 纪念奖,作者将奖金增补到该基金中)为本书中文版出版提供了资助。

Kym Anderson 和 Yujiro Hayami

1995 年 4 月

英文版序

农业贸易障碍并不是新问题。保护主义的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随后的扩大严重限制了传统食品出口国的贸易机会,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是如此。这些障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60—70年代首先是由日本,然后是其他新兴工业化的东亚经济食品进口的迅速增长所抵消了。虽然东亚经济过去同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实行的是阻碍农业生产的政策,然而在60—70年代,东亚却步西欧的后尘,采取了日益增加保护的农业政策。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向农业课税到扶持农业的转换可能是各国共同具有的政治经济原因,因此,农业保护可能会继续增长并变得更加普遍。

由于这样的政策趋势必定降低世界粮食经济的效率,所以几乎没有人考察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令人惊讶的。本书试图通过历史的和在国际的透视,对东亚农业保护的程度、原因和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里所述的研究始于1980年7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会上确定了所需研究的专门问题(见Anderson和George,1980)。专题讨论会后Kym Anderson作为福特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在东亚实地调查了近12个月。返回后,他和一批同事在各种专题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Yujiro Hayami是那些专题讨论会的最主要的参与者,并组织日本东京都大学的同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本书是对一些共同努力作出的分析的综合,虽然每一章都可以单独阅读,但它们连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第九章是全书的结论。除第2、5、6和7章外,这些资料均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作者对《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食品政策》和《营销与农业经济学》允许再次发表包括在那些章中的资料表示感谢。

许多人员和组织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各种支持,作者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澳日研究中心(A—JRC)主任 Peter Drysdale 从一开始就鼓励参与者并负责获得和管理大部分经济资助,组织参与者的各种海外访问。后来,澳日中心主席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校长 John Crawford 爵士也对项目提到了支持。农村信贷发展基金以分三年拨款给澳日中心的方式提供了最初的资金(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管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Ross Garnaut 领导的 ASEAN(澳大利亚经济关系研究项目)在东南亚进行了一个相似的研究项目,并为两个联合召开的专题讨论会提供了经济资助。日本的政策创新论坛资助了由东京都大学的 Yujiro Hayami 和他的同事承担的研究。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薪金使 Kym Anderson 能够在东南亚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汉城的韩国开发研究院、韩国国际经济研究院、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和台北的中华研究院的协作,则为调查提供了便利。除了要上面提到的表示感谢外,还要感谢为心甘情愿地打印和再打印手稿各稿的 Kerry Clift。

Kym Anderson 和 Yujiro Hayami

1985 年 1 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委托人的话.....	(3)
中文版序.....	(5)
英文版序.....	(7)
导言.....	(1)
第一章 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8)
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理论	(8)
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东亚的经验.....	(10)
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涵义	(15)
第二章 农业保护的增长	(20)
战前东亚农业保护的起源	(21)
战后东亚农业保护的增长	(25)
小结	(28)
东亚农业保护增长的国际透视	(28)
东亚保护增长的一些影响	(34)
第三章 农业保护主义的根源	(36)
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透视	(36)
1955 年以来政治市场的变化	(38)
为什么保护政策会很有效?	(44)
第四章 农业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一个计量经济学的 分析	(46)
变量说明	(46)
回归分析	(51)
结 论	(57)

第五章 农业保护对价格、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58)
模 型	(59)
结 果	(60)
完全开放的效果	(61)
部分自由化与继续增加保护的效果	(66)
结 论	(72)
第六章 日本大米政策的显示性偏好	(73)
日本大米政策回顾	(73)
模型	(78)
数据与估计程序	(81)
估计结果	(86)
政策目标和政府行为	(92)
第七章 日本和韩国牛肉进口配额的特殊合理性	(93)
理 论	(94)
实证分析	(98)
为什么进口牛肉配额仍然存在.....	(101)
第八章 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	(105)
战后保护需求的起源和渠道.....	(105)
农业人口的选举力量.....	(107)
合作社的力量.....	(108)
保护供给的决定性因素,1947—1972	(112)
保护供给决定因素的变化,1973—1979	(118)
农业保护决定因素的变化,1979—1984	(121)
结论.....	(125)
第九章 教训与借鉴	(127)
主要的经验教训.....	(127)
对东亚的借鉴.....	(131)
对欠发达国家的借鉴.....	(133)
对传统食物出口国的借鉴.....	(134)

第十章 富国和穷国：游说激励与保护形式	(137)
引言.....	(137)
建立价格扭曲政策分配效应模型.....	(138)
富国与穷国的参数值和模拟结果.....	(139)
为什么采用贸易政策而不采用更为有效的政策 手段	(143)
对政治改革的启示.....	(144)
附录 1 1955—1982 年农业保护估计的详细说明.....	(148)
附录 2 第四章回归分析中使用的解释变量	(172)
附录 3 世界粮食和肉类市场模拟模型详情	(179)
附录 4 价格扭曲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模型	(192)
注释.....	(199)
参考文献.....	(217)

表和图目录

表

表 1—1	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1880—1980	(12)
表 1—2	东亚占世界粮食和肉类市场的份额, 1960—1980	(13)
表 1—3	农业生产的产品结构,1955—1982	(14)
表 1—4	非农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1962—1980	(15)
表 2—1	日本帝国的稻米自足、农村研究和税收, 1903—1938	(22)
表 2—2	日本帝国稻谷价格及其名义保护率, 1903—1938	(24)
表 2—3	东亚的名义农业保护率,1955—1982	(26)
表 2—4	农民得到的稻米、水果及蔬菜价格指数, 1960—1980	(28)
表 2—5	十五个工业化国家(地区)农业的名义保护率, 1955—1980	(31)
表 2—6	欧共体和日本各种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 1955—1980	(33)
表 2—7	工业化国家进口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百分比, 1983	(34)
表 3—1	1955—1980 年结构调整指数.....	(40)
表 3—2	要素价格和要素比率,1955—1980	(42)
表 3—3	日本的农场规模与大米生产费用,1955—1980 ...	(43)
表 4—1	农业比较利益指数,1955—1980	(48)
表 4—2	十五个工业化国家(地区)名义农业保护系数的 决定因素,1955—1980	(53)

表 4—3	十五个工业化国家(地区)农业的重要性, 1955—1980	(54)
表 4—4	东亚农业保护增长,1955—1980	(56)
表 5—1	东亚粮食和肉类政策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 1980	(62)
表 5—2	东亚及其他发达工业国粮食和肉类政策对 国际价格与贸易的影响,1980	(64)
表 5—3	部分自由化对价格和贸易影响的预测值, 1985 和 1990	(67)
表 5—4	部分贸易自由化对生产和自给率的预期影响, 1988—1990	(68)
表 5—5	部分贸易自由化对国民经济福利的预期影响	(70)
表 6—1	日本大米经济主要指标,1961—1980	(75)
表 6—2	大米的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1965—1980	(76)
表 6—3	剩余大米的处置,1960—1980	(77)
表 6—4	国内均衡价格和剩余大米残余价值的估计值, 1965—1980	(84)
表 6—5	进口量和自给率的估计值,1965—1980	(86)
表 6—6	生产者净剩余增加额及其分解,1965—1980	(87)
表 6—7	消费者剩余减少额及其分解,1965—1980	(88)
表 6—8	政府费用及其分解,1965—1980	(89)
表 6—9	总损失额及其分解,1965—1980	(90)
表 6—10	无面积控制时大米政策社会成本的差异, 1970—1980	(91)
表 7—1	各种贸易自由化方案下牛肉消费者价格下降 的最大值,1977—1980	(99)
表 7—2	日本各种自由贸易方案的年直接效果, 1977—1980	(100)

表 7—3	韩国各种贸易自由化方案的年直接效果， 1977—1980	(101)
表 8—1	农业和非农业家庭的平均收入， 1948—1982	(106)
表 8—2	农村人口与就业，1935—1983	(108)
表 8—3	日本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和会员数量， 1950—1982	(109)
表 8—4	地方合作社商业活动的增长，1960—1982	(110)

附录中表

A1.1	日本农产品价格和名义保护系数，1955—1982 ...	(154)
A1.2	韩国农产品价格和名义保护系数，1955—1982 ...	(156)
A1.3	台湾农产品价格和名义保护系数，1955—1982 ...	(159)
A1.4	15 个工业化国家(地区)农产品价格和名义 保护系数，1955—1982	(162)
A1.5	表 A1.4 中计算保护时使用的转换率	(171)
A2.1	15 个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解释变量资料， 1955—1980	(176)
A3.1	世界粮食和肉类市场模型的代数一览表	(180)
A3.2	世界粮食和肉类市场模型中使用的福利措施	(183)
A3.3	日本粮食和肉类市场的主要参数	(186)
A3.4	韩国粮食和肉类市场的主要参数	(188)
A3.5	台湾粮食和肉类市场的主要参数	(190)

图

图 6.1	日本政府大米政策的效果	(79)
图 7.1	日本和韩国牛肉自由进口的效果	(95)
图 9.1	与农业产出相联系的农业研究经费	(133)